

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

——晚期罗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

李 隆 国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叶以来,由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进行经典性表述、延续了200年的“罗马帝国衰亡”模式受到了巨大挑战,以古代晚期研究为主力的“罗马世界转型”范式悄然兴起。本文在梳理这一学术转型,重点介绍这两种解释模式的同时,发现它们都起源于晚期罗马帝国,尤其是410年前后围绕西哥特人攻陷罗马而引发的大规模舆论冲突。由于各有庞大的史料作为支撑,昔日互不相容的两种交锋理论,在今天转化为观察晚期罗马史的两个互补竞争的模式。

关键词 罗马帝国衰亡 罗马世界转型 古代晚期研究 晚期罗马史

1776年,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发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一举成名。“任何喜欢咒骂的批评家都无法用他的吼叫干扰一片赞扬之声。”^①从学术史上看,现代学者认为,吉本通过这部六卷本的鸿篇巨制经典性地确立了“罗马帝国衰亡”模式,主宰此后学术界达两百年之久。“我们关于中世纪早期的整个认识都带有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色彩。无论我们翻开蒙森(T. Mommsen)、洛(F. Lot)、皮朗(H. Pirenne)、罗斯托夫采夫(M. Rostovtzev)还是贝尼斯(N. Baynes)的著作,只须提到一些最著名史家的名字,我们就发现他们不仅在与‘吉本命题’作斗争,而且还在与吉本本人搏斗,有时是隐隐的,但更多时候则是公开的。”^②斗争的结果之一,是从20世纪中叶以古代晚期研究为典型代表的“罗马世界转型”范式的兴起。“从前,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我们或者是中世纪早期史家、拜占庭学专家、古典学家、教父学家、晚期罗马帝国研究者,或者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0YJC770049)的资助。

- ① 爱德华·吉本著,戴子钦译《吉本自传》,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9—160页;杨肃献《吉本与罗马帝国衰亡史》,爱德华·吉本著,席代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14页。最近,M.温科勒从电影的角度,论述了吉本作品的广泛影响力。M.温科勒《爱德华·吉本与〈罗马帝国的衰亡〉》(M. Winkler, “Edward Gibbon and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M.温科勒编《罗马帝国衰亡:电影与历史》(M. Winkler ed.,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Film and History*) 威立-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45—173页。
- ② A.罗斯基《导言:吉本与启蒙运动》(A. Lossky, “Introduction: Gibbon and the Enlightenment”) 林恩·怀特主编《罗马世界的转型》(Lynn White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加州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29页。

是大迁徙的研究者,现在我们许多人认为自己是古代晚期研究者。如同种族生成一般,我们获得了新的身份,我们甚至办了两份报纸——《古代晚期》(法文,1993年)和《古代晚期杂志》——以示庆贺。”^①

新的“罗马世界转型”范式如何兴起,如何长期影响晚期罗马史研究,它与“罗马帝国衰亡”范式的关系如何?国内学术界业已注意到这种新的学术动态,或者从新旧更替的角度进行学术史梳理,^②或者介绍了转型模式下的诸多新成果;^③有学者甚至借鉴转型范式来考察罗马帝国文化的转型。^④本文拟从用学术传统的显和隐来评论,更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考察“罗马帝国衰亡”与“罗马世界转型”两种范式长期共存的史料学根源。

一、“罗马帝国衰亡”模式

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文化复兴,人文主义兴起。人文主义者不仅复兴了古代罗马如何兴起,而且重新提出了其如何衰落的古老问题。1453年,比昂多(Flavio Biondo)第一次以罗马帝国衰亡为标题写作历史《罗马帝国衰亡以来史》(*Historiarum Ab Inclinazione Romanorum*)。他选择公元410年阿拉里克攻陷罗马为开端,一方面是想模仿李维,转而叙述衰亡,另一方面则是续写奥罗修的《反异教史七书》。^⑤从此,探讨罗马帝国衰亡重新成为令人关注的问题。16世纪初艺术家瓦萨里第一次经典性地勾勒了艺术从衰亡到复生的千年史。^⑥此后各种看法层出不穷。^⑦

到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大卫·休谟等人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不约而同地论述了罗马文明衰亡。^⑧而英国学者吉本秉承时代潮流,用生花妙笔,从史学的角度将罗马帝国衰亡史加以经典性地叙述,最终确立“罗马帝国衰亡”范式。一方面,通过学习拉丁语,吉本掌握了大量罗马史资料;另一方面,在瑞士期间,他与自己素所崇拜的伏尔泰见面,从游多时,深受伏尔泰哲学思想的影响。结合史料及对时代的宏观反思,吉本决定写作罗马史“听见朱庇特神庙里赤脚的修士们唱起了晚祷曲,这时有个念头第一次涌上我心头:写下这个城市的衰落和灭亡的历史。”^⑨

虽然吉本先后指出了几十种导致罗马衰亡的因素,但是主要因素为三种:第一种是罗马作家信

① 爱德华·詹姆士《“古代晚期”概念的兴起与意义》(Edward James, “The Rise and Function of the Concept ‘Late Antiquity’”),《古代晚期杂志》(*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第1卷,2008年第1期,第20—30页。该刊第一期刊登了一组讨论古代晚期研究领域文章。

② 刘林海《史学界关于西罗马帝国衰亡问题研究的述评》,《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③ 侯树栋《断裂,还是连续:中世纪早期文明与罗马文明之关系研究的新动向》,《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

④ 王晓朝《论罗马帝国文化的转型》,《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⑤ 丹尼斯·哈伊《弗拉维·比昂多与中世纪》(D. Hay, “Flavio Biondo and the Middle Ages”),《英国科学院通讯》(*Proceedings of British Academy*)1959年卷,第97—127页。

⑥ 乔尔乔·瓦萨里著,刘耀春译《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世纪的叛反》,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1页。

⑦ S. 马扎里诺著, G. 霍尔姆斯英译《古代世界的终结》(S. Mazzarino, trans. by G. Holmes, *The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 法贝尔出版公司1966年版。

⑧ 伏尔泰著,梁守铿译《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8页;孟德斯鸠著,婉玲译《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4—110页。关于启蒙思想家对吉本的影响,可参考J. 波科克《野蛮主义和宗教》(J. G. A. Pocock, *Barbarism & Religion*)第2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以下;D. 沃梅斯里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转型》(D. Wormersle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⑨ 吉本著,戴子钦译《吉本自传》,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5页。

奉的自由丧失导致衰亡,即自由催生德行、专制带来奴役,从而使得德行丧失、国家衰亡;第二种和第三种则主要来自当时盛行的启蒙运动观念,即理性与文明。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相信人类历史是理性战胜迷信,文明战胜野蛮的双重变奏。而吉本则反其道而用之,将基督教的胜利视为迷信战胜理性;蛮族入侵则意味着野蛮战胜文明。基督教和蛮族的胜利导致罗马帝国衰亡。^①因此,总体上讲,罗马帝国衰亡史其实就是自由丧失、理性湮灭和野蛮肆虐的结果。^②

1896年,替吉本编订《罗马帝国衰亡史》定本的著名史家J. B. 伯里在表彰吉本的巨大影响之后曾条分缕析,逐一论述这部论著的过时之处与仍有价值之点。他的总结论是“否认吉本观点的大体真实性是徒劳无益的,对他的嘲弄也是微弱的。我们可能会更加同情罗马战士与教士,但是,所有的细节补充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软化‘罗马帝国衰亡’观点……在重要问题上,吉本仍然是我们的舵手,超越‘时代’,没有过时”^③。

伯里试图在修正中发展吉本命题。他强调历史变迁的缓慢性,认为不仅罗马帝国的衰亡,而且包括蛮族入侵,都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蛮族与罗马人之间有着广泛的合作与融合。江山易主无论如何也不是灾难性的。^④他的看法代表了当时在英语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学术观点。由他策划于20世纪初期出版的《剑桥中世纪史》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学术观点。该书第一卷虽然承认从奥古斯都到查理曼的800年间,无法进行时代划分,历史在延续;但是仍在使用“衰亡”、“普遍的毁灭”、“遗留”等关键词。约公元550年的时候,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旧文明的残余消失了。^⑤

对于伯里这一代历史学家而言,无论他们怎么强调历史的渐变,都无法摆脱罗马帝国衰亡的阴影。单纯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19世纪是个整理文献、编订各种古代中世纪历史作品的精校精注本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围绕制度的演变建立起宏大的历史叙事。文献学,表面对象是文本及其组成部分——语言,但是间接对象却是文本所承载的文化。无论如何面对文本,从阅读古典作品的典雅语言到中世纪早期拮据拗口、不合古典语法的晦涩拉丁语,半白不古,异体字丛生,衰落之感油然而生。另外,晚期罗马帝国历史在当时还属于中世纪史范畴,旧版《剑桥中世纪史》以君士坦丁开篇,从公元300年讲起。尽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世纪史研究走向专业化,中世纪学家开始其独特的训练培养方式,但是这些开创中世纪史研究的人们,自身所受到的训练还都是古典文化的训练。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会认同于古典文化,贬低中世纪文化。正是这种训练,使得他们与崇尚古典拉丁语的吉本,也与意大利人文主义以来的人文教育传统心脉相通,从而置身于一个伟大而漫长、贬低中

① 吴于廑《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重读〈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十六章书后》,《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吉本的具体论点,虽然散见于其前四卷作品中,第27章讨论帝国末期的颓废氛围;第36章则有对于罗马政治衰落的总结,等等。但是,在第38、71章有总结性论述。多谢本文匿名评审专家提示。

② 吉本的书发表之后,引来教士大卫的强烈批评,他为此专门出版《〈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5/16章某些段落的辩护》(Edward Gibbon *A Vindication of Some Passage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hapte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伦敦1779年版。

③ J. B. 伯里《导言》J. B. 伯里编吉本之《罗马帝国衰亡史》(E.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by J. B. Bury) 伦敦梅休因出版社1909年版,第vii—xxi页。

④ J. B. 伯里《蛮族入侵欧洲:讲演集》(J. B. Bury, *The Invasion of Europe by the Barbarians: A Series of Lectures*)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8年版,第vi页;J. B. 伯里《罗马队北高卢统治的终结》(J. B. Bury, “The End of Roman Rule in North Gaul”),《剑桥历史杂志》(*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第1卷,1924年第2期,第197—201页。

⑤ H. M. 郭特金《君士坦丁与君士坦丁堡》(H. M. Gwatkin, “Constantine and His City”) J. P. 惠特尼和H. M. 郭特金主编《剑桥中世纪史》(H. M. Gwatkin and J. P. Whitney eds.,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4年版,第1页。

世纪的文化传统之中。

他们将罗马帝国衰亡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历史事实,不加质疑,而是关注罗马帝国为何衰亡。^①甚至有学者认为罗马帝国的建立就意味着衰亡,其代表人物有美国中世纪史家林恩·桑戴克和古典学家沃尔班克(F. M. Walbank)。桑戴克说“至于如何精确地解释伟大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史料缺乏。已有许多尝试去解开谜团……可能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罗马帝国是奠基于已朽文明的废墟之上的,帝国不过是一件由破烂民族、专制主义以及过气文化编织的百衲衣。因此,罗马帝国自身就没有多少新生命,不过是地中海古代世界的最后阶段。”^②而影响更为广泛的类似观点则是由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提出的文明兴亡模式。在他的眼中,罗马帝国的繁盛不过如深秋的煦暖,而其文化早已丧失了创造力。^③

二、“罗马世界转型”范式

然而,就在伯里这一代人之后,对“罗马帝国衰亡”范式的真正挑战就开始了。20世纪20年代,以奥地利史学家道普什和比利时史学家亨利·皮朗为代表开始了第一波冲击。道普什以日耳曼蛮族文化并非原始落后的假定出发,反对历史灾变说。他从经济的角度,结合大量考古发现和地名研究,从加洛林时期向前追溯,论证这一时期历史的逐渐发展。在他看来,传统的历史分期主要依据于法典和法律术语,而忽略了真实的社会生活。日耳曼人并非文化的敌人,也没有毁灭和销毁罗马文明,相反,他们保存和发展了它。罗马世界是被日耳曼人从内部赢得的,是长达数个世纪的和平渗透的结果。在此期间,他们吸收罗马文化,接手帝国的管理;罗马并未衰落,罗马制度和文化一直在延续。^④

亨利·皮雷纳则秉持法语史家的传统,强调罗马文明的延续性。^⑤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从更加宽广的视野,从长途贸易与经济转型的角度强调罗马帝国文明的长期延续。在他看来,直到8世纪,地

① 据德国学者德曼特(Alexander Demandt)的总结,各种衰亡原因达200多种,转引自K.盖林斯克著《古典与现代交融:后现代建筑、多元文化、衰落与其他》(K. Galinsky, *Classical and Modern Interactions: Postmodern Architecture, Multiculturalism, Decline and Other Issues*),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1—73页。有代表性看法,分别参考M.钱伯斯《罗马衰亡:能够被解释么?》(M. Chambers, *The Fall of Rome: Can it be Explained?*),纽约1963年版;D·卡甘编《罗马帝国的终结:衰落还是转型?》(D. Kagan, *The End of the Roman Empire: Decline or Transformation?*),希斯出版公司1978年版。吴柔曼曾专门撰文对钱伯斯作品进行了介绍,吴柔曼《关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原因的几种论点》,《世界历史》1983年第4期。对晚期罗马帝国的研究动态的介绍,叶民著《最后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笔下的晚期罗马帝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8页。

② L.桑代克著《中世纪欧洲的发展和文明》(L. Thorndalke, *Medieval Europe: Its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乔治哈拉普出版公司1920年版,第57页。F.沃尔班克《西部罗马帝国的衰落》(Frank W. Walbank,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科比特出版社1946年版。

③ 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五部。

④ A.道普什著, M. G. 比尔德和 N. 马歇尔英译《欧洲文明的社会与经济基础》(A. Dopsch, trans. by M. G. Beard and N. Marshall,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伦敦1937年版。这是一部编译本,原作者提供了删节本。在删节的过程中他强化了原著论述的批判性和系统性。

⑤ 围绕罗马因素还是日耳曼因素奠定现代欧洲制度之根基的问题,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形成了所谓罗马学派和日耳曼学派。前者主张罗马因素起主导作用,以法国学者库朗日为典型代表,他主张一切所谓日耳曼因素从文献证据来说,都是起源于罗马文明的。C. 斯蒂芬森《封建主义的起源和意义》(C. Stephenson, "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Feudalism"),《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46卷,1941年第4期,第788—812页。史学史上的系统总结可参考E. 汤普森著,孙秉莹、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93页以下。

中海贸易圈一直还维持着欧洲商业的统一性,长途贸易继续联络着各地,使得交换经济得以延续。但是,随着阿拉伯人的兴起最终割裂了地中海贸易圈的统一性,将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从地中海贸易世界分离,使得查理大帝统治的法兰克帝国不得不转入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时代,实现了经济史上的裂变。“日耳曼人定居在地中海沿岸决不标志着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时期的转折点。尽管这事所引起的后果是巨大的,然而并未把过去彻底摧毁,也未打断传统。”^①皮雷纳的经典表述是“没有默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②。

道普什的观点在当时就被评论家被誉为成功挑战了“罗马帝国衰亡”模式。巴尼斯说“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对罗马文明被日耳曼蛮族迁徙的浪潮吞没的传统观点有了彻底的再评价。我们不再相信古典和中世纪世界之间存在裂变,衰落是缓慢的,大量罗马传统延续到中世纪文化中。伯里、第尔(S. Dill)和洛(F. Lot)已充分证明这一点,而道普什的观点则是最彻底和最令人信服的。”^③

而皮雷纳的贡献则更加受推崇。50年代美国学者李昂以为从此“突变论”开始让位于“渐变论”。^④道普什和皮雷纳主要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挑战“衰亡”模式,侧重于从新的角度重申历史现象。道普什指出,日耳曼人不是原始的和野蛮的,而在逐渐文明化;皮雷纳认为地中海贸易统一性一直延续。但是,无论他们如何挑战,与他们的同时代人和前辈一样,他们都没有能够跳出“罗马帝国衰亡”模式。诚如有评论者指出,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衰亡的时间和方式提出了修正。^⑤因此,他们是在不同程度上用新的衰亡模式取代经典的衰亡模式。

约在十年之后,以林恩·怀特为首的一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者开始在继承皮雷纳的基础上超越皮雷纳。他们认为,皮雷纳有许多具体的真知灼见,但是,他与“罗马帝国衰亡”模式的创建者爱德华·吉本一样,具有强烈的“西欧中心论”色彩。如果仅仅将视角局限于西欧,难免将中世纪早期视为衰落时期。但是,如果一方面将地理上的视野横向放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视为古代地中海文明的继承者;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上将视野向下拓展,关注普通民众和日常经济生活,历史的面貌就大为不同了。他们为此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口号“罗马世界转型”。“今天,随着历史学淡化地域偏见,我们西方人觉得不那么需要对历史采取剧变论解释。我们用‘罗马世界转型’的

① 亨利·皮雷纳著,陈国樑译《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页。最为简明扼要而系统的表述,则是其在德国战俘期间写作的亨利·皮雷纳《欧洲史》(Henri Pirenne, *A History of Europe*),乔治·亚伦和昂温出版公司1939年版,第31—38页。对皮朗命题的最新讨论,王晋新《皮朗与“皮朗命题”——对西方文明形成时代的重新审视》,《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

② 亨利·皮雷纳《默罕默德与查理曼》(Henri Pirenne,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乔治·亚伦和昂温出版公司1954年版。

③ H. E. 巴尼斯《评道普什》(H. E. Barnes, “Review on Dopsch”),《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第3卷,1938年第2期,第299—300页。

④ B. 莱昂《近期关于中世纪的若干反思》(B. Lyon, *The Middle Ages in Recent Historical Thought*),华盛顿1959年版,第1—7页。莱昂的老师卡尔·斯提芬森是皮雷纳的高足;莱昂曾经访学比利时,求教于皮雷纳之子,并写作长篇传记, B. 莱昂《亨利皮雷纳的人生与学术》(B. Lyon, *Henri Pirenne: A Biographical and Intellectual life*),加州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因此他的褒奖有些过头。

⑤ 艾琳·鲍埃尔《关于转型问题的评论》(E. Power, “Review: A Problem of Transition”),《经济史评论》(*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10卷,1940年第1期,第60—62页。应该说,因为视野新颖、观察角度独特以及结论出人意料,皮雷纳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其史料运用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突破。考古学家尤其对此批评较多,霍吉斯甚至认为皮雷纳的观点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这一时期缺乏足够的可靠史料。换言之,皮雷纳的看法缺乏史料支持。R. 霍吉斯著《查理曼时代的城镇与贸易》(R. Hodges, *Towns and Trade in the Age of Charlemagne*),达克伍出版公司2000年版。而在欧盟成为现实的今天,皮雷纳所提出的从地中海到欧洲的转型,被许多学者接受,用以从新的角度考察史料,宏观与微观结合出许多新成果。由布里尔集团出版的《罗马世界的转型》项目的13册结项论文汇编和讨论集,就是典型代表。

表述取代‘罗马帝国衰亡’,有些转型是不幸的,但是有些转型却意义深远。”^①他们正确地指出,“罗马帝国衰亡”模式忽略了社会经济史的下层,也就是千百万农夫和手工业者的生活;而社会变迁却必须在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变化中才能最终得到实现。“自下向上看”,使得以政府灭亡论为历史分期的观点变得有些不合时宜。

怀特提出的新表述标志着新范式的诞生。1993年,欧盟科学委员会提出了为期五年的泛欧洲性大型研究项目“罗马世界的转型与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兴起”。来自18个国家的近百位学者,从跨学科的角度分六大团队围绕这一宏大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仅项目的题目源自于怀特的新表述,而且作为该项目成果的第一部论文集《帝国内的王国》公开表彰了怀特促成范式转型的卓越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绝对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林恩·怀特成功地取代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范式,提出了‘罗马世界转型’的新范式。”^②这一欧盟项目也号称在承袭皮雷纳的学术探索。该项目的总协调人之一、英国利兹大学教授颜武德在项目总结报告中说:“一言以蔽之,项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皮雷纳命题的再思考,即地中海古代世界不是在5世纪至6世纪被日耳曼入侵者撕裂,而是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③

与此同时,在解释罗马帝国为什么灭亡的过程中,拜占庭史的研究者率先意识到有比较研究的必要,为此需要将东西部帝国同时纳入考察范围。在20世纪初,伯里就大胆地挑战包括吉本在内的前代成说,认为他们属贬低东部帝国的偏见。通过强调历史的延续性,他甚至否定“拜占庭帝国”的提法,而是坚持使用“晚期罗马帝国”;甚至认为根本就不存在476年罗马帝国灭亡这么一回事。^④在他之后,以N. H. 贝尼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继起,进一步认为:西部发生了文化断裂,东部才是古代文明的继承者。他们从比较的角度发问,“为何帝国没有在西部留存,而东部保留且继续存在了千年之久?”为此需要寻找东西部的差异性。在他看来,小亚细亚为东部帝国提供了人力和财富的持久来源,能够抵挡蛮族的入侵;保存帝国的行政管理控制全境,维持罗马文化的延续。^⑤

受到贝尼斯等人的启发,琼斯通过三大卷《晚期罗马帝国史》,系统地揭示了帝国内部组织结构的生机和活力。他的研究再次有力地说明,帝国尽管存在内部缺陷,但是导致这些缺陷变成致命性因素来自于蛮族的入侵。即罗马帝国灭亡的根本性原因来自于外部,而不是像吉本和伯利所想象的那样是自然死亡。“帝国内部的脆弱性并不是其衰亡的主要因素。”^⑥通过证明帝国自身没有衰落的必然性,他的研究为学术潮流的改变提供了最为广泛的基础工作。

20世纪60年代目睹着“罗马世界转型”说慢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1963年,在调查各种关于罗

① L. 怀特编《罗马世界的转型:两个世纪之后看吉本命题》(L. White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Gibbon's Problem after Two Centuries*) 加州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301页。

② W·波尔《导论:帝国与蛮族融合》(W. Pohl, "Introduction: The Empir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Barbarians") ,W·波尔编《帝国内的王国》(W. Pohl ed., *Kingdoms of the Empire*) 莱顿布里尔1997年版,第1—11页。

③ I. 伍德《欧洲科学基金会“罗马世界转型与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兴起”项目报告》(I. Wood, "Report: The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s Programm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oman World and Emergence of Early Medieval Europe") ,《早期中世纪欧洲》(*Early Medieval Europe*) 第6卷,1997年第2期,第217—227页。

④ J. B. 伯里《晚期罗马帝国史》(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889年版,第v—ix页。

⑤ N. H. 贝尼斯《罗马权威在西欧的衰落:近来的解释》(N. H. Baynes,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Power in Western Europe. Some Modern Explanations") ,《罗马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第33卷,1943年,第29—35页。

⑥ A. H. M. 琼斯《晚期罗马帝国:284—602年》(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 - 602*) 第2卷,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1964年版,第1068页。

马帝国衰亡的解释理论之后,钱伯斯最后提出怀疑“谈论罗马衰亡的时候,我们对吉本的判断表示勉强同意,即便是西部帝国衰亡也是个模棱两可的历史事件。帝国的消失可以另外表述为这种制度转型为中世纪的国家,然后是现代欧洲。”^①到70年代,“罗马世界转型”说开始受到关注,尽管还处于次要地位。1978年由卡甘主编的《罗马帝国的终结:衰落还是转型?》就比钱伯斯著作的1962年版增加了一个副标题,表明两种模式之间的竞争态势。^②到80年代,“罗马帝国衰亡”范式就有些非主流了。1986年,当费里尔发表《罗马帝国衰亡的军事解释》的时候,他要为自己还在研究衰亡的原因而进行辩护:“不难理解为何目前历史学家对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厌倦情绪了,这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感觉,没有人能够找到令大多数学者满意的答案。自吉本以来也没有多少‘新资料’,新发现的重要文献相对很少。尽管有几处令人感兴趣的考古工作在开展中,但考古学家更关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米诺阿和迈锡尼世界的浪漫领域,以及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③因此,哈佛大学教授鲍埃索克在1995年,发表“罗马帝国衰亡范式的消退”演说,庄严宣告“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位负责的史家还会将罗马的衰落视为事实或者范式。作为在现代史上曾经起过作用的建构,这一范式现在已告终结。”^④

就在“罗马帝国衰亡”模式因为缺乏新史料而令历史学家感到“厌倦”、晚期罗马史不那么吸引研究者的时候,爱尔兰裔史学家彼得·布朗却发现了大量“新史料”,吸引大批追随者,并开辟了新的专门研究领域——古代晚期,为晚期罗马史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如果彼得·布朗不是古代晚期之父,那他肯定也是其主导者。”^⑤

三、“古代晚期”的兴起

所谓“古代晚期”是一个历史时期概念。狭义而论,指的是约公元300年至600年的300年时间,相当于从君士坦丁皇帝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尤其指五六世纪。广义而论,则向前可追溯到公元50年至150年不等,后及公元800年,总共约六百年时间;更有论者希望将其扩展至公元1100年左右^⑥。从地理上讲,古代晚期以地中海为中心,包括古典文化所辐射到的地域,从不列颠的哈德良长城到中东的幼发拉底河流域;也可以延伸至南到印度河流域,北抵葱岭以西。核心区域是地中海沿岸,罗马人所谓的“内湖”,边缘地区则包括受到罗马文化影响的区域。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涵盖地中

① M. 钱伯斯《罗马衰亡:能够被解释么?》,第1—6页。

② D. 卡甘编《罗马帝国的终结:衰落还是转型?》(D. Kagan, *The End of the Roman Empire: Decline or Transformation?*) 希斯出版公司1978年版。

③ A. 费里尔著《罗马帝国衰亡的军事解释》(A. Ferrill, *The Fall of Roman Empire: the Military Explanation*) 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6页。

④ G. W. 鲍埃索克《罗马衰亡范式的消退》(G. W. Bowersock, “The Vanishing Paradigm of the Fall of Rome”),《美国艺术科学院通讯》(*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第49卷,1996年第8期,第29—43页。

⑤ 爱德华·詹姆士《“古代晚期”概念的兴起与意义》,类似的提法,还出现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主页上他的简历中。http://www.princeton.edu/history/people/display_person.xml?netid=prbrown。

⑥ 关于古代晚期的断限,一直有讨论,例如A. 马可耐《漫长的古代晚期?对断限之争的反思》(A. Macrone, “A Long Late Antiquity? Considerations on a Controversial Periodization”),《古代晚期杂志》(*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第1卷,2008年第1期,第4—19页;C. 安多《衰落、灭亡和转型》(C. Ando, “Decline, Fall, and Transformation”),《古代晚期杂志》第1卷,2008年第1期,第31—60页;C. W. 霍莱斯特《欧洲历史分期与中世纪之不存在》(C. W. Hollister, “The Phases of European History and the Nonexistence of the Middle Ages”),《太平洋历史评论》(*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61卷,1992年第1期,第1—22页。

海古代文化孕育的三大宗教信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古代晚期”本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1901年,奥地利学者李格尔在其《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一书中就提到过“古代晚期”概念,认为这个概念不仅在当时已经流行,而且“最贴近实际情况”;但是,他还是倾向于将“上起君士坦丁大帝,下迄查理大帝”这一段时期称为“罗马晚期”。因为他想到的是罗马帝国,研究的地域侧重于拜占庭帝国。^①此后,不仅在德语世界,“古代晚期”(Spätantike)一直被学者沿用;而且,在英语世界,用“古代晚期”作为论著标题的例子也并非鲜见。^②但是,真正在广大学术界和读者之中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使之成为独立的历史研究领域的则是彼得·布朗。早在1966年,他就在牛津大学发起成立“拜占庭与北方和东方的邻居们:公元500—公元700年”新专业,实际上标志着“古代晚期”研究的开始。1971年,布朗发表通俗读物《古代晚期世界》(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标志着“古代晚期”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

与李格尔相类似,布朗的《古代晚期世界》也聚焦于拜占庭帝国的艺术,但是围绕基督教文化作了更为广泛的文化史研究,他大量使用了“古代晚期”这个概念并获得成功。在《古代晚期世界》一书中,彼得·布朗开宗明义对流行的“罗马帝国衰亡”命题提出挑战,转而关注古典世界的转型。“贯穿本书的主题是公元200年后古典世界各种界域的不断转移和重新定位,这与传统的‘罗马帝国衰亡’命题没有什么瓜葛。‘罗马帝国衰亡’仅仅影响到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政治结构,这一事件未对古代晚期的文化发源地——地中海东部和近东——造成损伤。即使对于六七世纪西欧的蛮族王国来说,残存于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仍然被当作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帝国,也沿用其旧名——共和国。古代晚期人们所迫切关注的问题是各种固有界域的痛苦调整。”^③布朗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否定将罗马帝国政府作为历史变迁的核心力量,而是存在多种变化各种转型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关系。“只能说某些变化以某种方式相伴发生,以至无法孤立地加以理解。”

也是在这一年,布朗发表《古代晚期圣徒的兴起及其意义》一文,借鉴文化人类学方法,运用圣徒传来讨论圣徒崇拜如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兴起,它又具备哪些社会功能。在这篇文章中,他秉持一贯的风格,将东部地中海与西部地中海进行类型学比较,纵向上打通古代与古代晚期,成功地超越教父学的框架,开放圣徒研究,既开发了圣徒传这一古老而数量极其庞大的“宗教”史料的新价值,又为普通历史学家研究宗教现象打开了一扇大门。^④

如果说布朗在写作《古代晚期世界》时将论说的重心放在拜占庭,构建了一个以拜占庭为中心的古代晚期世界,对传统的西部帝国的处理并没有太多新见的话;那么在1996年出版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中,他成功地超越了皮雷纳的8世纪衰落论。通过构建从古代通向现代的“潜在通道”,

① A. 李格尔著 陈平译《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② A. 德曼特《古代晚期: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的罗马史》(A. Demandt, *Die Spätantike: Römische Geschichte von Diocletian bis Justinian 284 - 565 n. Chr.*) 柏林2007年版,第xv—xxi页。最近追溯“古代晚期”兴起的论著较多,例如J. 里布舒伊茨:《古代晚期的发生》(J. Liebeschuetz, “The Birth of Late Antiquity”) J. 里布舒伊茨编《古代晚期的衰落与变迁:宗教、蛮族与相关历史书写》J. Liebeschuetz ed. *Decline and Change in Late Antiquity: Religion, Barbarians and Their Historiography*) 埃希盖特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593—610页。

③ P. 布朗著《古代晚期世界:从马尔库斯·儒勒留到默罕默德》(P.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From Marcus Aurelius to Muhammad*) 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公司1971年版,第19—20页。

④ P. 布朗《圣人在古代晚期的兴起与意义》(P. Brown, “The Rise and Function of the Holy Man in Late Antiquity”),《罗马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第61卷,1971年,第80—101页。1996年,为了庆祝这篇文章发表25周年,由卡梅隆等教授主持在牛津大学专门组织了一次研讨会。

他使得西部欧洲彻底走出了“衰亡”观的阴影。首先,他认为西部帝国的历史不再是一个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其次,这是一个为现代欧洲奠基的新时代,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最后,在古代晚期,蛮族实用性地利用基督教,逐渐地创造了对自身过去的认识,西欧独特的基督教想象世界由此开始定型。因此,古代晚期是发展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潜在铺路时代。^①换言之,通过古代基督教世界转型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古代晚期前接古典文化,后接“加洛林文艺复兴”,不仅使得古代世界自然而然地转型为现代世界;而且这种转型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是激动人心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与前辈拜占庭史家如贝尼斯等不同,通过比较之后,他否认东部在延续,西部发生断裂。恰恰相反,整个罗马世界都在不断地转型,适应形势,开创未来,为现代欧洲奠基。

2001年,布朗与一批学者发表《阐释古代晚期:后古典世界论集》,正式宣称“编者们都相信,现在是将约公元250年至800年间的历史当作一个独特而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期的时候。”^②2008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发行《古代晚期杂志》,主编拉尔夫·马提森愉快地宣布“从编年属性来讲,我们本来属于‘古代罗马’、‘早期拜占庭’、‘中世纪早期’、‘晚期拉丁’、‘教父学’等等,但是现在都属于‘古代晚期’。”^③201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古代晚期”纳入了其“通识读本”系列,出版了《古代晚期(通识读本)》,^④标志着“古代晚期”作为一个独立学术领域被学者们广泛接纳。

对于布朗所构建的转型模式,论者批评最多的包括两点。第一是其过分强调延续性与结构性转型,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变迁,尤其是剧烈的政治军事变化。“像‘衰亡’和‘危机’之类的词汇,暗示帝国末期的困难,在20世纪70年代极为常见,现在基本上从历史学家的词汇表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些中性词汇,如‘转化’、‘变迁’和‘转型’。”^⑤尤其是考古学家,对于6世纪发生的历史断裂坚信不疑。英国考古学家霍吉斯依据一百多处考古发掘遗址认为,断裂确实存在,城市的面貌今非昔比,在6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他甚至提出“史家文化”和“考古学家文化”,认为前者偏重于文献,从词汇的继续使用推断历史在延续;而后者则从实物发现了历史的巨变,因此二者需要多加交流。^⑥

第二点则针对古代晚期研究者观察视角的偏颇性,他们似乎从过分集中于政治和制度转向过分聚焦于宗教文化。“‘古代晚期’具有沦为奇风异俗之域的危险,充满了旷野的修士、兴奋的贞女,并由宗教、心态和生活方式的冲突所主宰。在这种图景中……各条新的战线正在拉开。例如,基于教

① 彼得·布朗著《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P. Brown,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33页。本段论述,承包情怡提出修改意见。

② G. W. 埃索克《导言》(G. W. Bowersock, "Introduction"), G. W. 埃索克等主编《阐释古代晚期:后古典世界论集》(G. W. Bowersock etc. ed., *Interpreting Late Antiquity: Essays on the Postclassical World*) 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ix页。

③ R. 提森《编者语》(R. Mathisen, "From the Editor"),《古代晚期杂志》(*The 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第1卷,2008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存在布朗学派。应该说,布朗长期执教英美名校,讲课富有激情,受其影响者不在少数。他培养的一批又一批学生,成长为从事于古代晚期研究的专门人才,对传播布朗的理念和方法,推动古代晚期研究的兴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2011年5月布朗荣休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为此召集学术研讨会,他的学生二十多人集聚一堂,都提交了高质量的论文。笔者这里侧重于通过布朗来谈论“古代晚期”这一学术研究领域的兴起,而略过了其他诸多学者的贡献,如牛津大学的卡麦隆(Avril Cameron)等。

④ G. 克拉克著《古代晚期(通识读本)》(G. Clark, *Late Antiquit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⑤ B. 瓦德-帕金斯著《罗马衰亡与文明的终结》(B. Ward-Perkins,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古代晚期研究的重要成员,牛津大学的卡麦隆教授也承认结构很难解释变迁。卡麦隆教授2010年2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发表的《关于罗马和中国比较研究的一些思考》的演讲。

⑥ R. 霍吉斯著《查理曼时代的城镇与贸易》,第11—27页。

会的召唤和自身社会身份之间的冲突,家庭成员之间彼此斗争。以教堂和修道院为主体的新型宏伟建筑成为新兴权威和影响力中心的集中表现。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成为来自各地的修士们的新家园,而东部行省则由于其内部那令人陶醉的文化融合,易于发生变迁。”^①

其实,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偏颇却源自布朗最大的贡献之所在——发掘新史料和严格依据文本研究历史。在古代晚期兴起之前,历史学家研究晚期罗马史的时候,在实证主义原则下拷问史料“客观真实”,所感兴趣的主要史料也限于对各种“真实史事”的记载。琼斯的罗马帝国制度史研究就是最为经典性的代表。他博闻强记,熟谙原始史料。^②但是,在他的心目中,一大批史料是完全可以被排除在阅读范围之外的,这些史料主要就是宗教史料。“当我利用古代史料的时候,我得承认,穷其一生不足以尽读;任何浏览米涅(J. P. Migne)的《教父大全》(*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es*)的人都会深有体会。我很快就决定放弃关于神学的论述、对《圣经》的评注以及世俗美文(奥索尼乌和克劳迪安自然例外)。那里有些麦穗,但是在我看来,稗子占主体,许多最好的麦子已经被先前的学者们收割了,尤其是17和18世纪的学者,他们所编订的教父文献是充满奇异信息的矿藏。在阅读了相当一部分之后,我最终放弃了布道辞,因为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圣经》的评注,或者涉及泛泛而谈的伦理话题。”^③

琼斯编订的史料选集《罗马史:至5世纪》第二卷“帝国时代”,正是这一史料选择原则的实物载体。围绕帝国行政管理,按专题分类编选,包括元首制、皇帝、元老阶层、骑士阶层、行政服务、军队、行省、城市、税收、司法、身份、经济事务和宗教,凡13章346页;宗教内容仅是其中一章,不到30页,不足全书的1/11。^④

这些被琼斯认为是“稗子”的史料,长期以来也不被其他史家看好,以致普遍缺乏现代精校精注本。琼斯所阅读的这些“良莠不齐”的教会史料,主要来自19世纪中期法国教士米涅汇编的《教父大全》。《教父大全》所用版本较老,印刷质量尤差,排版也很拥挤,“阅读界面”并不好。与其他受到史家重视的史料版本形成鲜明的对照,例如《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不仅琼斯如此,即便是天主教史家,对这些宗教史料也不是都喜欢。例如,被认为是古代晚期开创者之一的法国教父学家马儒(Henri-Irene Marrou)将圣徒传视为令人讨厌的杂货,类似于今天的小说连载。^⑤因此,一方面,许多经典史料被反复研究,另一方面许多“稗子”史料长期无人问津。“古代晚期的许多文献还没有被充分研究过。有些作品的年代、写作地域和历史背景尚未确定……古代晚期文献的写作格式和主题反

① A. 卡麦隆著《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公元395—600年》(A. Camero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 AD 395-600*), 罗德里奇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6页。

② J. R. 马丁克尔《晚期罗马帝国人名录》(J. R. Martindale, *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第1卷, A. 卡麦隆编:《人名录五十年:晚期罗马帝国、拜占庭及其他》(Averil Cameron ed. *Fifty Years of Prosopography: The Later Roman Empire Byzantine and Beyond*)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页。琼斯的巨大影响, D. 奎恩编《琼斯与晚期罗马帝国》(D. Gwynn ed. *A. H. M. Jones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 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7年版。

③ A. H. M. 琼斯《晚期罗马帝国:284—602年》,第vi—vii页。

④ A. H. M. 琼斯《罗马史:至5世纪》(A. H. M. Jones *A History of Rome Through the Fifth Century*)第2卷,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0年版。

⑤ P. 里歇《斐迪南·洛的〈古代世界的终结与中世纪的开始〉导读》(P. Riche, “Préface à Ferdinand Lot *La fin du monde antique et le début de moyen âge*”) P. 里歇《中世纪西欧的教育与文化》(P. Riche *Education et cultur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埃希盖特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x页。

映了时代的风气,每一件史料都需要根据当时的背景进行解释和评价。”^①

布朗研究的领域是文化史和教会史,基于利用原始史料的原则,他认真对待这些宗教史料;又利用文本研究,充分挖掘其中的历史信息。在他看来,这些史料中虽然“客观史实”少,但是有意无意地反映了文献作者和当时人的认识。在布朗看来,现代研究者往往“太容易发现那个时代的新和旧,而往往忽略了去感受人们在那个世界如何生活?”布朗要做的就是“通过提供证据,集中于讨论古代晚期世界的人们如何面对变迁”^②。借此,彼得·布朗引领读者穿越现代数百年罗马帝国衰亡的学术传统积累层,直面当时人们的宗教感受,从事心态史和文化史研究。

因此,布朗的研究不仅将当时的一切文化现象都纳入研究范畴之内,而且也为此些研究指示了“新史料”。虽然这些“新史料”本是旧史料,但是从新的角度去利用,用以回答新问题,也就摇身一变成了“新史料”,从而改变了晚期罗马史的史料构成。2000年,马斯为关心古代晚期的学生和普通读者编订了新的史料集——《古代晚期史料读本》。他似乎刻意模仿琼斯的史料选集,也采取按类而编,13章凡355页。这13章分别是罗马帝国、罗马军队、基督教会、多神教、犹太人、女性、法律、医药、哲学、波斯、日耳曼入侵者和他们的王国、中亚人和斯拉夫人,还有伊斯兰教。^③与琼斯的史料集篇幅相若,而内容悬殊,形成鲜明的对比。

正是依托于新史料,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等新兴社会科学,短短几十年,作为文化史研究的古代晚期吸引了大批研究者,渐成显学。已成气候的古代晚期研究,开始反过来惊讶于晚期罗马帝国史研究的顽强生命力了。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瓦德-帕金斯的《罗马衰亡和文明的终结》、希特的《罗马帝国的灭亡:新罗马和蛮族史》;2007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出版米切尔的《晚期罗马帝国史:公元284—641年》。^④他们的著作或者与古代晚期划清界限,或者反驳古代晚期研究。瓦德-帕金斯和希特代表了修正后的衰亡范式,充分借鉴了考古学成果和文本分析技巧,强调蛮族入侵中断了历史的进程。而米切尔则继承琼斯的学术路径,特意回归到政治军事史。因此有评论者据此提出“罗马帝国衰亡模式的回归。”^⑤这些大出版社的动作,自然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也引起人们思考如何处理新旧范式之间的关系。

① R. W. 马提森《古代晚期的民众、个人表述和社会关系》(R. W. Mathisen, *People, Personal Expression,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Late Antiquity*)第1卷,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② P. 布朗《古代晚期世界:从马尔库斯·儒勒留到默罕默德》,第6—7页。

③ M. 马斯编《古代晚期史料读本》(M. Maas ed., *Readings in Late Antiquity: A Sourcebook*) 罗德里奇出版公司2000年版。作为布朗的学生,马斯所编订的史料集与琼斯的史料集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地展示了古代晚期研究者与罗马帝国史研究者的异同。作为罗马帝国晚期史研究的集大成者,琼斯侧重于研究传统性的政治、军事、和法制史,通过对事关军国的史料的细致梳理和总结,为罗马制度史提供了最为系统深入的总结。而以布朗为代表的古代晚期研究者则更多地从文化和宗教的角度关注时人的心态、与社会运作;前者更多地关注国家层面,后者则是社会层面;前者关注政府管理制度,后者关注文化与权力运作;前者可能更富有事件史的味道,而后者则明显有整体史情结。但无论如何,二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十分密切。

④ B. 瓦德-帕金斯的《罗马衰亡和文明的终结》(B. Ward-Perkins,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 希特的《罗马帝国的灭亡:新罗马和蛮族史》(P. Heath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S. 米切尔的《晚期罗马帝国史:公元284—641年》(S. Mitchell,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 D. 284 - 641*) 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7年版。

⑤ J. 鲁屯伯格和A. 埃克斯泰恩《评论文章:罗马衰亡模式的回归》(J. Rutenburg & A. Eckstein, “Review Article: The Return of the Fall of Rome”) 《国际史评论》(*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第29卷2007年第1期,第109—122页。

四、范式互补的历史与历史学根源

上述三部论著颇有挑战性,尤其是瓦德-帕金斯和米切尔开篇便有理论检讨,指出古代晚期研究的局限性,提出自己的分析思路,论证其合理性。“罗马帝国衰亡”范式似乎并没有因为新范式的兴起而式微。在评价米切尔作品的时候,汉弗里斯承认,“平心而论,更为保守的分析方式(即‘罗马帝国衰亡’范式)并不是没有追随者,但是没有吸引同样多的学生。”但是,他认为“布朗派的坚决拥趸者可能会觉得这部书的某些部分会将他们引到极不熟悉的领域;但是这并不就是一件坏事情。”因此,“这部书没有彻底地同情布朗刻画的古代晚期印象可能恰恰成为其说服力之所在。米切尔为读者提供了更加宽广地了解古代晚期的机会,皇帝、官员和将军,与宗教和多彩的文化转型同样重要。”^①

在古代晚期的热心追随者看来,当古代晚期研究步入中年,检阅已取得多方面成就的时候,米切尔等人的书有些不合时宜。“就古代晚期研究的未来而论,这是一部不和谐的作品,也是一部令人失望的作品。”不仅如此,“如果政治和军事史学者都贬低宗教和文化,忽视对它们进行单独研究的价值,这是最令人寒心的”。因此,评论者在提醒大家避免古代晚期研究内部碎片化的同时,主张以古代晚期研究来整合旧的研究模式,“政治史和军事史还是应该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而非竞争者和替代者。”^②

更为谨慎的评论者不仅承认旧范式与新范式之间的互补性,而且强调新范式并非要取代旧范式。(新范式)尽管富有影响,但是并没有重塑学术圈,原有的研究继续强有力地存在。作为新来者,古代晚期研究贡献了额外的思考,而非根本性重新定位。它只是搭建了跨越继续繁荣的固有学术领域的脚手架。^③这一评论更加符合学术的现实图谱。从学术史来看,“罗马帝国衰亡”范式与“罗马世界转型”范式,不仅植根于自文艺复兴以来悠久的学术传统,而且有着更深厚的渊源,各自拥有庞大的史料土壤,保证它们枝繁叶茂,各领风骚,竞争互补。

这两种范式都起源于罗马帝国晚期,甚至可以说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几乎同时发生。当公元前后期帝国取代共和国的时候,就出现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声音,并逐渐形成传统。西塞罗、李维、萨鲁斯特、塔西佗,只需提及这些大名鼎鼎的作家足矣。他们认为,从共和国转向个人统治就意味着自由的丧失,走向奴役,故德行开始沦丧,世风日下,以致神不佑罗马,罗马衰亡。^④进入4世纪,与帝国几乎同时形成的基督教开始成为国教,基督教会会在牺牲罗马固有宗教崇拜的基础上大规模扩张,无形中与专制统治相结合,打击对手,理性与狂热信仰的冲突加剧。与此同时,蛮族的威胁日益加剧,由于语言差异而形成的文明与野蛮之别,格外醒目。关注罗马帝国的命运,围绕自由与专制,理性与信仰,文明与野蛮,罗马帝国知识分子的思考产生了重大分歧。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这是自公元前390年左右高卢人攻占罗马之后,近八百年来

① M. 亨弗里斯《书评》(M. Humphries, "Review"),《古典评论》(The Classical Review)第58卷,2008年第1期,第235—237页。

② R. 范达姆《书评》(R. Van Dam, "Review"),《布林莫尔古典评论》(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2007年6月13日。

③ A. 吉勒特《罗马的衰亡与欧洲的兴起:以古代晚期为视角》(A. Gillett, "Rome's Fall and Europe's Rise: A View from Late Antiquity"),《中世纪评论》(The Medieval Review)2007年10月12日。

④ 撒路斯特提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喀提林阴谋》,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7—103页;李维著,穆启乐等译《建城以来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页;塔西佗著,王以铸、崔妙因译《编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页。

罗马再次被攻陷,因此对整个帝国产生了巨大震撼,各派围绕“基督教与罗马帝国衰亡”终于形成对立的两大阵营。以奥古斯丁及其学生奥罗修为代表的教父们为一方,声称因为罗马民众迷恋异教,信仰不虔诚,故有罗马沦陷之厄。但是由于信仰基督教,减小了罗马沦陷的损失,至少教堂没有遭到大规模劫掠,躲入教堂的民众得以保全生命。在他们眼中,这次事故是好事,不仅表明现世的荣华富贵靠不住;而且通过这场“灾难”,可以使得世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一切归主,虔诚信仰,从而实现从追求此生荣华向追求来世永生转型。^①通过布道,写作圣徒传、注释《圣经》等宗教作品,教父们拒绝讨论帝国衰亡与否,而是转化视角,从讨论政治军事转向谈论文化,谈论人生之得救与终极关怀,从注视世俗得失转向仰望天空,沉思上帝与天国,引导生活转型。他们为“转型”说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文献史料。

而晚期罗马帝国不断丧师失地,不仅西部帝国彻底消失,而且整个帝国疆域在不断缩小,衰落成为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西部皇帝消失前夕,政客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都在文献中流露出帝国危机之感。^②异教徒作家甚至认为,皈依基督教使得罗马不再受到诸神护佑,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勾引蛮族,导致统治野蛮化,加之自由沦丧,故有衰落。这幅图景就是被誉为“帝国衰亡史”第一人、公元6世纪的历史学家左其姆(Zosimus)的《新史》所提供的历史叙事。他将罗马帝国的衰落经典性地定位于导致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的统治后期,“直白地说,他是导致帝国今日可悲状态的罪魁祸首”^③。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不仅使得“衰亡说”成为一种现实写照,而且也为后来的史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西部帝国消失之后,至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称帝之前,西部欧洲普遍视君士坦丁堡为罗马帝国的新首都、最高权威来源。掌控文化的教会人士很快就遗忘了西部帝国灭亡这件历史事件。查理曼称帝之后,高卢教会开始伪造著名的《君士坦丁赠与》文书,声称君士坦丁皇帝东迁到拜占庭,是为了将西部帝国的统治权让与罗马教皇西尔维斯特及其继承人。而罗马教皇最终将这种统治权赠与查理曼,西部罗马帝国复兴。因此,中世纪的西欧学者很少谈论罗马帝国的衰亡,而是谈论帝权的转移。^④

① 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C.藏戈麦斯特编《奥罗修反异教史七卷》(C. Zangemeister, ed. *Pauli Orosii Historiarum adversum Paganos*),涂博勒出版公司1889年版,Ⅶ.28。J.贝利甘《双城:作为历史范式的罗马帝国衰亡》(J. Pelikan, “The Two Citie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e as Historical Paradigm”),《代达罗斯》(*Daedalus*)第111卷,1982年第3期,第85—91页。李隆国《透过战争说和平:奥罗修与基督教史学的转型》,《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75—185页。

② “帝国就像被暴风雨倾覆的船只,没有舵手,肢体破碎。”A.西多尼乌斯著,W.安德森英译《西多尼乌斯诗歌与书信集》(*Sidonius: Poems and Letters*, trans. by W. B. Anderson),哈佛大学出版社1936年版,第6—7页。“在毁灭帝国的厄运和意外事件中,罗马内部的力量消失,曾经表示友好、服从于罗马法的外部诸族起兵反抗它。”T.蒙森编《小编年史集成》(T. Mommsen ed. *Chronica Minora Saec. IV. V. VI. VII.*)第2卷,柏林1894年版,第309页。

③ 左齐姆著,F.帕修德英译《新史》(*Zosime*, trans. by F. Paschoud, *Histoire Nouvelle*),铭文学会出版社1971年版,Ⅱ.34;W.高华特《记载罗马衰亡的第一位史家》(W. Goffart, “The First Historian of the Fall of Rome”),W.高华特《罗马衰亡及此后》(W. Goffart *Rome's fall and After*),汉布尔顿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81—110页。左齐姆的看法渊源有自,更早的时候,4世纪的史家尤托皮乌(Eutropius)认为君士坦丁的统治,前后有变化,由好变坏。拉丁原文参考C.桑提尼编《尤托皮乌建城史简编》(C. Santini ed. *Eutropii Breviarium Ab Urbe Condita*),涂博勒出版公司1979年版,X.7,第67页。亦可参考尤特罗皮乌斯著,谢品巍译《罗马国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④ J.密特克和C.弗掠伊勒编《柳博尔德·贝本伯格政治著作集》(J. Miethke und C. Flüeler, *Politische Schriften des Lupold von Bebenburg*),《德意志文献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之《中世纪晚期政治著作》(*Staatschriften des späteren Mittelalters*),汉诺威2004年版,第269页。雅克·勒高夫著,徐家玲译《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175页。

文艺复兴之后,作为历史分期的“中世纪”形成,并沦为“黑暗时代”,横亘于古代(古典)与现代之间。人文主义者复兴古典文化,复兴了从世俗价值标准来判断历史,在复兴“衰亡说”文献的同时,也复兴了“衰亡说”。到吉本手中,获得其经典性表达形式。但即便是吉本本人,在论述衰亡的时候,也承认基督教的胜利“减轻了颠覆带来的冲击,缓和了征服者残暴的心态”。

20世纪中叶,一方面,现实的变化使得“罗马帝国衰亡说”受到极大挑战,二战后迅速的经济复苏以及对战前文化的追忆,不仅彰显了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也激励思想家鼓吹文化的复兴;另一方面,从宗教文献理解罗马晚期社会的布朗,重新引领读者回到罗马帝国晚期的“稗子”文献,发掘时人的喜怒哀乐,从而复兴了教父们对世界转型的看法,将古代晚期研究深深地扎根于教父们开创的伟大传统之中。

可以预见,当古代晚期研究在复兴教父传统的时候,围绕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命运而展开的争论也必将会复兴。争论双方不仅各有悠久的史学传统,而且也有庞大的史料作为支撑。在现代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之下,争论将会更加细腻,而不会成为直接对立的两派。但是,从史学史的角度而论,由于受到史料二元化的制约,两大阵营还是会隐隐存在。但是“罗马帝国衰亡说”与“罗马世界转型说”将不再是教父们与异教徒之间争锋相对的争吵,而是在互补中交流。

当晚期罗马帝国的时候,教父们眼望苍穹,思维上帝,转换角度,思索理想社会。而异教徒学者和开明基督徒作家,则远没有教父们如此高超的信仰境界。他们更多地关注于现实生活本身,目光平视,思考人间的喜怒哀乐。现存君士坦丁的巨大头像,其中一只眼球向上,仰望天空;另一只眼球平视,似乎在关注自己统治的子民。或许“罗马帝国衰亡说”和“罗马世界转型说”就是我们观察晚期罗马史的两只眼球?分别直接植根于这两种社会追求和两类历史文献的“衰亡”范式与“转型”范式,或偏重于挖掘晚期罗马世界的“现实生活”,或揭橥其“理想追求”。作为现代学者,似乎正需要折中于理想与现实之间,超越于“衰亡”与“转型”范式之上,得之于情,合乎其理,揭示一个更加全面的晚期罗马世界。

[本文作者李隆国,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国洪更)